

河南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再 版 说 明

本书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8月出版，印5200册，早已售完。现根据读者要求，经略加修订后再版。参加修订工作的有：方晴初、路庭训、李春光、魏一明。因时间仓促以及修订者水平所限，难免仍有讹误及记述偏颇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辛亥革命与开封十一烈士·····	张 绛 (1)
河南大学“六二”学潮前后纪实·····	庞兰亭 (11)

赵侗的生平事迹·····	赵得龙 周伯明口述 刘亚荃整理 (22)
关于汤恩伯·····	吴绍周 (34)
刘茂恩的反动军政生活·····	马凌甫 (61)
回忆蹉将生活与军阀生活·····	范龙章口述 张润三整理 (78)
我所知道的孙殿英·····	张和宣 苏勋丞口述 张知人整理 (118)
我所知道的张岚峰·····	王翔九 (136)
丁树本在濮大区“抗日”反共投敌始末	

李范九 田汉卿 李春林 郭效英等口述 柴界五整理	
·····	(153)

内乡团阀刘顾三·····	张和宣 (172)
--------------	-------------

附录:

南阳诸葛庐·····	史锡荣 (195)
------------	-------------

辛亥革命与开封十一烈士

张 绛

辛亥武昌首义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革命高潮的推动下，作为河南省城的开封，既经历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又演出了一出“拥护共和不独立”的丑剧。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一方面，是对长眠在古城南关辛亥革命烈士陵园的十一位烈士的深切怀念；另一方面，将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

同盟会在开封

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最初，在东京的河南留日同学中，加入同盟会的有曾昭文（可楼，河南光山人）、车钺（翰如）、朱奋吾等人。

一九〇六年，设在开封演武厅的河南武备学堂，选派了五十名学员赴日本留学。抵东京后，孙中山当即接见了他们中间思想进步的学员。孙中山亲切地对他们说：“清朝政府政治腐败，压迫剥削，视人民如牛马，若不将清朝推翻，我们永无翻身之日。你们参加革命，我们是欢迎的。尤其是你们直、鲁、豫三省的人，忠诚、朴实、勇敢，多是豪杰之士。欢迎你们加入同盟会。”不久，开封去的五十名学员中，就有刘积学、杜潜、陈伯昂等十七人参加了同盟会。

河南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愈来愈多，活动日益活跃。他们先后创办了《豫报》、《河南》、《女界》等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杂志总经理、后来牺牲于开封的河南起义军总司令张钟端（毓厚，河南许昌人），在一九〇八年五月出版的第四期《河南》杂志上，明确提出，要革命，“一纸请愿书，固为无效，即以多数舆论，多数政党而徒为是和平之行动，其要求亦必无功。故欲大告成功，完全以达其要求之目的者，则舍革命军而外，更无他道以处此也！盖吾为此言，吾非好为暴动而不惜流血之惨状也。吾实见其非此不足以达此目的。”

一九〇八年，同盟会总部议决，由留日各省同盟会支部，派人归国办理同盟会分部，组织内地革命分子，以便内外联络，将由言论时期，进入实行时期。于是河南同盟会支部决定派杜潜等密赴开封组织河南同盟会分部。杜潜等至开封，密约杨汉光（名定西）、暴式彬（字质夫）、韩立纶（字警亚）、杨源懋（字勉斋）、刘芬佛、李心梅、刘纯仁、王庚先、张宗周等，会商设立机关及发展同盟会会员等事。当时议定暂设秘密机关于开封南关中州公学。因杨源懋为该校校长，暴式彬为教务长，杨汉光等均为教职员，故得此莫大之便。当时，陆续加入同盟会者二百余人，中州公学学生几乎全部加入。这是开封同盟会组织建立的开始。

一九一一年三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总部决定再派人回国内联络，以互相策应，纠正过去各省单独行动，势单力薄的弊病。留日河南同盟会支部的刘积学（字群士）受命回开封活动，向同盟会会员传达总部决议。开封同盟会分部议定，除派人联络军队和地方武装外，并拟在开封、北京分别筹办《国是日报》和《国维日报》，以宣传革命。

初次酝酿独立

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革命军起义，河南巡抚宝芬大惊，急忙派遣陆军五十八标一个混成标，由标统张锡元带领，南下堵截，开去火车一列，另有子弹接济车一辆，开至武胜关。

开封同盟会会员听到武昌首义的消息后，精神大振，部分负责人刘纯仁等，于八月廿二日（十月十三日）在禹王台法政学堂召集秘密会议。会议分析了河南形势，共商了河南独立大计。

当时，驻防开封的陆军二十九协（旅）协统应龙翔（字云从），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又是黎元洪的姻亲，革命党人曾错误地认为他可以依靠、信任，所以内定应龙翔为独立后的河南都督，河南咨议局议长方贞为民政长。还推派刘纯仁为政学界联络员，刘炳阁任巡警方面联络员，吴沧州为陆军和陆军小学联络员。同时，准备再派人到全省各地串连，以响应省城独立。

会后，陆军二十九协排长吴沧州以请假省亲为借口，会见了协统应龙翔，探听他对革命的态度。吴沧州把革命党人内定的意见谈了以后，应龙翔十分惊恐，连忙说：“河南比不得湖北，开封比不得武昌，我到任不久，两位步兵标统都反对我。你们保定军校毕业的同学，虽然在本协有三十多位，但职位不高，多半是排长或掌旗官，连长只有三人。学识虽比行伍出身的强，但带兵都毫无经验。宪兵营长徐积阶是留日士官同学，同我一道来的，而兵只不过二百余人，枪弹不足，无法补领。此外，骑兵营长王丕煥也是留日士官同学，去蒙古买马未回。五十八标业已调到武

胜关，五十七标正在向豫西开拔。开封城内外驻有刘鸿顺、柴得贵两路巡防，不断同本协留守部队发生冲突。自从武昌起事的消息传来后，抚台对我未免怀疑，我只得天天到巡抚衙门伴他们吃喝打牌，在军事上他们对我保密。在此处境下，我已经电请军咨局把我调回北京。”吴沧州立即将应龙翔这种口头上同情革命，但又胆怯的态度向刘纯仁做了汇报。刘纯仁说：“应协统胆子太小，不是革命党。我们自己想法子干吧！”

是时，河南咨议局的一些议员也参加了革命党的活动。他们对于开封清军南下围剿革命军和西进抗拒陕西革命党，都持有异议，并与在上海的黄兴、宋教仁等有电报联系。所以，袁世凯任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后，曾发电解散河南咨议局，电文中指责说：“汴议局自议长杜严，副议长杨凌阁辞职后，议员诸人，举止离奇，多方煽惑。”“清军汉阳之捷，该局暗助南军，飞电指责内阁，且密电黎元洪，泄露消息。陕西残杀，惨无人理，清军进驻潼关，保全豫境，乃该局电请内阁，指为不应防剿。”“陆续又电内阁，誓与朝廷断绝关系，宁死不纳租税等语。”由此看来，河南咨议局一些议员似乎相当革命，其实他们多数都是改良主义者，实际并不赞成革命。这在后来开封那场“拥护共和不独立”的滑稽丑剧中，就表现得更充分了。

面对开封这种动乱局面，巡抚宝芬进一步加强了应变措施。一方面，为了推卸责任，免担风险，以自己有病，申奏清朝内阁，速派新抚来汴接替；另一方面，又假意表示自己愿携家眷离汴，愿将河南政事交与陆军二十九协协统应龙翔，把应骗到巡抚衙门扣押，并着令张锡元接任协统职务，加强防范。开封初次酝酿独立，至此受到严重挫折。

但是，革命党人并未气馁，又议决分东西南北四路，到各地

联络红枪会、仁义会等民众团体组织武装起义，进而再推动省城革命。

再议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后，清朝政府束手无策，决定再次起用袁世凯。袁世凯自光绪、宣统之交被罢官退居河南安阳洹上村后，无时不想再起。但他要弄手段，开始，嫌湖广总督官职太小，遂以“足疾未愈”为由，借以推辞；继而，拿进攻湖北革命军为代价，爬上了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座。但他眼见各省纷纷独立，深感清朝政权难保，所以又阴谋利用革命军势力来钳制清朝政府，以实现他个人的野心。

同盟会会员张钟端认为，河南地处中原，如能光复，对全国必将产生重大影响。于是在武昌首义后，他自愿请求回开封秘密组织起义。张从湖北回开封时，还持有黎元洪致陆军二十九协协统应龙翔的秘密信件，因应龙翔已被巡抚宝芬软禁而未交出。于是，张钟端又联络陆军二十九协司令部陆军警察教练所第一大队长徐仁甫（字廷麟）等人。经过分析，大家认为巡防营统领刘鸿顺、柴得贵等所属官兵太旧，而陆军二十九协中新兵连、排长虽有新思想，但刚被提升的协统张锡元绝不会同情，因此，在军队内建立革命武装还不可能。最后决定，除在军队内继续开展活动外，必须抓紧同已经分赴各地的革命志士联络，以建立统一的革命武装。

袁世凯是河南人，他当了内阁总理大臣后，对河南的控制特别严，因此激起了河南革命志士的极大愤懑。武昌起义后不久，全国除河南等少数几个省份外，都已先后宣告独立。当时河南的

形势，自初次酝酿独立之后，分赴各地联络的革命党人，都已取得一些成果，如兰封、考城、朱仙镇一带，已联络民众几千人。而巡抚宝芬又于十月十三日（十二月三日）奏准因病离汴，新任巡抚齐耀琳（字云岩，吉林伊通州人）到任不久。这些都是开封革命党人决定发动起义的有利条件。

张钟端等人组织的革命机关，最初设于开封北土街和合堂，后又移至优级师范学堂。南关法政学堂也是一个秘密活动点。经过联络，省城内外革命志士共推张钟端为河南起义军总司令，张照发为革命军协统，刘凤楼为革命军督队长，王天杰为敢死队总队长，徐振泉为敢死队先锋，张得成为暗杀团团长，单鹏彦为敢死队队长，李鸿绪为决死队队长，王梦兰为民军总指挥，崔得聚为民军总招待等。并议决于十一月初三日（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十二时，举火为号，进行武装起义。

是日，城外的红枪会、仁义会等民众组织已按计划向开封进发。参加起义的城内外新军也做好了准备。驻在南关禹王台的炮兵营正将四门管炮移至小高地，准备向巡抚衙门开炮。

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古城开封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

志士血洒古城

当时，开封清军布防也十分严密。陆军一标驻省城南关外，巡防马步队其中四营驻城内。巡防营统领柴得贵因与革命党人张照发同过事，假装同情革命，而暗中派巡防营稽查张光顺和江玉山二人打入革命军。张光顺首先向革命军协统张照发表白愿意参加起义。开始，张钟端等人均对他表示不信任。张光顺又假惺惺地在

夜间焚香发誓，歃鸡血为盟，终于骗取了革命军的信赖。

十一月初三日（阴历）夜，张钟端等革命志士正分头在各起义地点，准备行动。夜十一时，清军按照张光顺、江玉山的密告，突然进行全城大搜捕。由于革命党人毫无戒备，张钟端等人均被逮捕。就连原定举火为号的几个地点也被清军严密监视。结果，等候在城外的红枪会、仁义会等千余人，一直等到半夜，也不见信号。拂晓，不得已才都撤去。开封这次起义遂告失败。

十一月初五日（阴历），河南巡抚齐耀琳致内阁请代奏电中称：“豫省近因土匪（指各地民团）纷扰，派兵四出剿办，兵力日单。早有内匪（指革命志士）勾结乘机起事之谣。初三日，据探匪首张钟端、李干公等业已约定于夜间起事。当经飭令巡警道邹道沂、陆军协统张锡元、后路统领刘鸿顺，探明匪等约会地点，酌带得力兵警，随同眼线前往搜捕。其时，城内见有火光数处，因早已探明系该匪等所为，立即救灭。张锡元在城外拿获李干公等六名，邹道沂、柴得贵、刘鸿顺在城内之万寿寺等处拿获张钟端等三十六名。均经起获枪械多件。讯据张钟端等各供蓄意纠合外匪乘机起事，约定于初三夜半，城内外放火开枪为号，先攻铁塔寺之子弹库，烧劝业商场，一面枪劫藩库官钱局，再行焚抢衙署。考城、太庙及朱仙镇等处均已约有一、二千人作为援应。并拆毁铁路，拉断电线。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当查此案张钟端、李干公等，纠结匪党，意图焚劫，伙至数千人之多，若非明正典刑，何以弭大乱而申国法。即将该犯张钟端等十一名，按照阵前办法，立即处死。”初五日晨，张钟端、王天杰、张照发、刘凤楼、单鹏彦、徐振泉、张得成七同志英勇就义于西关；李干公、王梦兰、李鸿绪、崔德聚四同志牺牲于南关。

张钟端等十一同志被捕后十分英勇，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清军审问张钟端道：“你们引匪聚众，放火暴动，若不承认，以大刑处之。”张坚不承认自己是土匪。被毒打后，他愤然回答：“汝以为我为何等人，即何等人。日后自有公论。”审官又问：“汝是何职务？”答道：“河南军政府参谋长。”继问同党共有几人？答曰：“除汉奸外，皆我同党。”是日，遇害时狂风大作，张钟端等人毫无惧色，沿途高呼：“共和万岁！”“革命万岁！”

一出“共和”丑剧

张钟端等十一位同志就义前后，河南立宪派的一些政客，在袁世凯的密谋下，正策划着一出“拥护共和不独立”的滑稽丑剧。

河南汲县人王锡彤，原以教书为业，后同袁克定（袁世凯子）、王肖庭等人经办洛潼铁路，与袁世凯亦有交往。张钟端在开封组织起义时，王锡彤的儿子也曾参与。表面上，王锡彤与革命党人也有联系，并常以开明士绅自居。

张钟端等牺牲后，王锡彤的儿子几经斡旋，幸得开脱，但武装流血却吓破了这些上层知识分子的胆。这时，王锡彤等一些政客正住在北京，见全国各省纷纷独立，常为河南事议论。有的主张独立，有的认为独立危险，地方秩序不好维持，最后想出了一个“请愿共和不独立”的办法。

阴历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凯约见王锡彤，当时还不知河南拟“共和不独立”之事。袁世凯向王锡彤表露对清廷的一些不满之后说：“近日为君主民主，余力竭声嘶。为保皇室之尊严，不意竟以此相待。国之将亡，殆无能救，公辈愿如何即如何尔。在河南久有筹划，即归河南做去可也。”王说：“近数日我辈宗旨变

矣。”袁世凯表示很奇怪。王接着说：“河南，公桑梓邦也，决不能独立，独立则损公望，况河南既独立，山东独立虽取消，亦仍是独立，直隶亦要独立，果省省独立，纵京能保，而号令不出都门，公之声名将一败涂地，故决不能独立也。”袁世凯点头称是。遂又问：“诚然，此事将如何？”王说：“近日与肖庭、馨庵（张镇芳，袁世凯的爪牙，是镇压河南革命党人的刽子手）等已研究一个办法，请愿共和，但不独立。直隶、山东、河南皆照此办法去矣。”袁世凯大喜。当即嘱王锡彤等人回河南行事。临行之前，袁世凯再次召见王锡彤、王肖庭等人。王肖庭还提出：“临敌易帅，古人所忌，巡抚齐耀琳当留。”袁世凯亦表同意。

阴历十二月十六日，王锡彤等人到达开封当晚，即约见巡抚齐耀琳。起初，齐耀琳接袁世凯密电，仅告之以极有势力的豫绅将来汴，还不摸底细，遂先传巡防营设防后方才相见。当听罢王锡彤等说明“请愿共和不独立”的来意后，立即表示赞成。只是提出，必须由地方绅士联名呈请，方可代奏。

第二天，王锡彤等面晤开封士绅，均对“请愿共和不独立”之事欣喜万分。有的还说：“幸而吾辈适来，若再迟几日，张钟端之祸，不知又演几次矣！”立宪派的嘴脸暴露无遗。

第三日（阴历十二月十八日），巡抚齐耀琳即致电内阁，代奏河南咨议局议长方贞等恳请宣布共和。电文中说：“查该局所陈各节，均系实在情形。近日叠接军界文电，亦无不希望共和宣布，即使召集国会付之公决，大势所趋，必多同意。耀琳力支危局，两月于兹，虽幸挽独立之风潮，而各界主张共和益形剧烈，官绅士庶异口同声。”齐耀琳这个枪杀张钟端等十一同志的刽子手，居然也摆出拥护共和的面孔来了，真是滑稽之极！

辛亥烈士墓纪念碑

站在开封火车站向北望去，可以看见一座造型别致的尖塔——南关纪念碑。不少人把它附会为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其实，这座塔和辛亥革命并无关系。

南关纪念碑是一九二八年冯玉祥在开封时建造的。起先，冯玉祥是为纪念他的好友成慎而建的。成慎是河南商邱人，辛亥革命时，曾伙同赵倜镇压著名的白朗起义。赵倜为河南督军，成慎任第一师师长。后来二人矛盾，成慎战败自杀。在建塔过程中，又感到只为成慎一人，意义不大，遂改称纪念阵亡将士塔。

一九三四年，刘峙在开封时，把散葬在禹王台的辛亥十一烈士墓，迁葬于南关纪念碑的东侧（即今开封市供销社院内），重新为十一烈士撰写了碑文。同时，将纪念碑改为“革命先烈纪念碑。”于是，有些人就把它和辛亥革命联系起来了。

解放后，开封市人民政府将烈士墓妥加修缮。一九六三年，又将残倒在禹王台柏树林中的辛亥革命十一烈士之墓碑，经过修补，竖立于烈士墓前，并定为开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安息于烈士墓的十一烈士，看到我们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惟烈士墓夹在供销社院内，凭吊瞻仰，至感不便，亟应迁至适当地方，永资纪念。

河南大学“六二”学潮前后纪实

庞兰亭

参加河南大学“六二”学潮的同学，当时是不少的。这次学潮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现在把我参加这一学潮所接触的情况，写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一九四五年底，河大由陕西宝鸡迁返开封，一九四六年春季开学。这时候，国民党的河大党部和三青团的团部，在全校各院系都进行活动。但广大学生和部分三青团员，对国民党党部登记成员、召集会议等的反应是冷淡的，对于他们在班上的活动，很鄙视，不屑一顾。因此他们就乘机窃取了学生会的领导权。学生会当时曾规定，各班出壁报和学生个人或集体出壁报，要到学生会登记，可是谁也不理睬。在七号楼走廊里，个人或集体贴的壁报，谁也不去登记。

为了在学生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共豫皖苏区一地委（即商丘地委）在开封的地下支部，组织开封高中、开封师范部分学生在新街口二十三号开设了个一间门面的小书店，叫“小开书店”。同时还利用与山河书店的关系，通过该书店河大门市部在河大学生中进行工作。当时开封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是张方明，支委有王运廷、李蔚人、马忠先。

通过阅读进步书报、杂志，如《新华日报》、《群众》、《主流》、《文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还有一些唯物主义哲学书

籍，以半公开或秘密的方式传递阅读，把进步同学团结起来。还利用壁报的形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贪污腐败的反动本质。如田培林当校长时的总务长陈奇秀，仅在修筑从大门口到七号楼这一段的路面时，就贪污了法币五百万元之多（当时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法币三千多元）。其他用项方面的贪污可想而知。因此在田培林不干校长而换成姚从吾的时候，陈奇秀在南京为田培林修建了一座小别墅。由此可知，这些人的贪污腐败到了何等程度。当时，教授的薪水不能按时发，学生的贷金也设法进行克扣，而且物价飞涨，教授的薪水真成了“薪水”，因每月工资只够买“薪”与“水”。学生生活更是困苦。民主则更谈不到，进步书刊、杂志，不要说图书馆不准有，就连同学们互相传阅的也派特务学生监视。他们还从当时省政府和高等法院聘任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棍来学校教书代课，向学生灌输反动思想。虽然学校的一切机构都掌握在反动派的手里，可是他们腐败、反动的行径，却激起了大多数学生的不满。他们派在各班的特务学生，整日鬼鬼祟祟，不上课，不读书，同学们都深恶痛绝。他们一发言，下面就发出“嗡嗡”“嗤嗤”声，都说他们是说人话不办人事的“特”字号。

一九四六年暑假后，大批青年军被派到河大来，名为上学，实为镇压进步力量。青年军成立联谊会，就和国民党的河大党部、三青团部及原来在校的中统、军统特务学生勾结在一起，干着破坏革命的勾当。然而在中共的秘密串连和革命宣传的影响下，还是有不少学生和进步人士紧密地团结在中共组织的周围，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阴谋诡计。一九四六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藉苏联红军进军东北，组织反苏游行。尽管在河大的青年军和反动党团，以及中统、军统特务到处奔走，学校当局又三令五申，但学生们

反应非常冷淡。最后以青年军的大队人马出动，同时在“苏联占领东北是侵略”、“苏联撤出东北军队”、“反对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等口号欺骗下，也蒙蔽了一小部分学生，跟着他们去游行。他们的反苏游行，给以后的各种进步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反苏游行后没有几天，又相继发生了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善事件和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昆明枪杀西南联大学生的“一二·一”事件，更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愤慨。这时在各院系的青年军和反动党、团、中统、军统特务学生，则极力为美国士兵的兽行辩护。

在反苏游行时，由于学生会被当时的反动势力所操纵，在迷惑学生上起了一定作用。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必须把学生会的领导权拿过来，不能让它成为反动派的工具。于是就开展了争夺学生会领导权的斗争。改选学生会的要求提出来了。我们通过串连组织活动，力争把各班有正义感的进步学生，选做班的理事，至少也要选持中立态度的学生，绝不能让青年军和反动党、团、中统、军统特务学生当选。反动派方面也拼命去争夺理事席位。斗争的结果，二、三、四年级进步力量占了优势。一年级（当时在南关河沿，称为二院）因为青年军多，反动学生占了优势，白昆、张策（解放后均被镇压）等青年军特务学生更为嚣张。据说他们曾在南关二院，深夜帮助特务机关绑架进步学生。学生会改选后，虽然以青年军为主要力量的反动势力在学生会中仍占有一定的席位，但是他们处于少数。这次选举，中共地下党支部支委马忠先在医学院被选入学生会。学生会主席是文学院的张四德。

新学生会的组成，进步力量占了优势，就在一九四七年春天开展了抗议美国士兵奸污女大学生的反美示威游行。一天上午，

校本部全体学生整队出发，由于青年军特务学生的阻挠，二院的同学只有一部分参加。队伍沿途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军滚出中国去”、“严惩美国凶犯”等口号，还在街道两旁贴标语。当时“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设在自由路，游行队伍经过那里时，同学们还用英语高呼“DOWN. WITH U. S. A”“YAN KEE GO HOME”。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着了慌，连忙加派门岗，军队、宪兵一长排站在门口，象木头人一样站着。院内空洞洞的，美国人员只敢偶尔从窗口张望一下，立刻就缩回去。这次示威，直到中午才整队回校。从此以后，美国人在大街上的蛮横气焰才有所收敛。这次游行示威活动给学生以很大的锻炼，斗志更昂扬了。接着是为支援教职员工增薪要求而举行罢课，教授也罢教，从一九四七年春天开始就没有上课。在反美示威游行后，由于当时的特务报纸《力行日报》登载了污辱河大女学生的消息，引起了学生的公愤，纷纷要求学生会采取行动。学生会在同学们的支持下，组织一批学生开着校车到省府前街特务报社进行质问。由于特务报社集合特务，持枪阻挡，未能进入报社内。这次质问《力行日报》，虽然没有成功，但增强了同学们的革命信心。

一九四七年春天，长期罢课和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使同学们进一步地认识到，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造成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学生所得助学金不足以维持生活，特务横行，根本谈不到民主、自由，进步人士和学生遭到迫害，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反人民的内战，已经弄得天怒人怨。当时，全国学生都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河大学生会也积极领导学生开展这一运动。可是以青年军为首的反动势力却在阻挠，尤其是白昆、张策、赵飞等特务学生，横行霸道，多方破坏，激起了学生